

第一章

引論：把「天下」帶回歷史敘述： 一個民國前期隱退的視角^{*}

五四學生運動時，正在中國的杜威曾把運動描述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 (the birth of a nation)」。¹而五四運動的當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則是此時「中國算有了『社會』」。²他們一是運動當事人，一是現場觀察人，對五四的即時認知顯然是不同的。這樣的歧異表述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一方面提示出五四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存在，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國家」和「社會」這兩大外來概念及其反映的實體，此時或許尚在形成中，所以出現這類見仁見智的表述。

這樣看來，五四不僅如我們一般所知的是個時代分界點，它還見證和表述了「國家」和「社會」在中國的「誕生」。而尚在誕生中的國家和社會，又已成為觀察和認識五四的媒介和描述時代變遷的詮釋工具。不僅如此，五四時代其他重要新名相，包括標誌性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等，與

* 本文的一些早期想法曾以「從天下視角看五四」為題，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的「世界的五四與地方的五四」工作坊（2018年8月22日）上陳述，與會學人的評議給我不少啟發。正式成稿後，承清華大學的李欣然、四川大學的周月峰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王波以及四川大學博士生徐君玉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1 “John Dewey from Peking,” June 1, 1919, in John Dewey and Alice C. Dew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 by Evelyn Dewey, New York, 1920, p. 209.

2 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約1919年），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

國家、社會一樣，都是模稜的。時人據此進行的相互探討和爭辯，也常常是「無共識的共論」。³

名相的模稜本身意味着它們的意義正在形成，尚未凝固；而其背後隱伏的，則是那個時代的脈動。中國的近代，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一個過渡時代。⁴在這一較長的過渡時代中，五四又是一個過渡性的短時段，很能體現其所在時代的過渡特性：它常被視為界碑，似乎劃分了時代；卻又以其豐富而多面的實踐，能動地連接了時代；⁵更以其長存難滅的遺產，展現了歷史的延續。⁶

前述杜威和傅斯年的不同認知，直接提示了「國家」和「社會」這類基本名相在五四時期的模稜，又揭示出那個時代一個更具根本性的變化——天下的崩散。近代中國一個宏闊的時代轉變，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變——向外轉化成了「世界」與「中國」，向內轉化成了「國家」和「社會」。其間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讓人無所適從又不得不有所抉擇。⁷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說，五四前後，特別是五四後，思想界對究竟是推進「社會」領域的改造還是「政治」層面的革命，曾有一場辯論。這些爭論背後，是怎樣認知、界定和因應「社會」與「國家」的問題，而其核

3 參見羅志田：〈思想史中名相的模稜〉，《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後關於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清華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

4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1901年），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27-32頁。

5 五四運動的廣狹兩義便是一個顯例，廣義的五四正以狹義的五四為連接。

6 白話文的使用，就是至少三千年的一個大轉變，也是一個可持續的歷史性轉變。參見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

7 天下的崩散不僅有這裏所說的內外轉化，還有不少未轉未化的面相，卻被國家、社會等新名詞遮蔽而常使人視而不見，故其造成的困擾遠更繁複。這個問題甚大，當專文探討。

心則是「天下」含義的現代演化。⁸換言之，五四前後國家與社會的緊張，很大程度上是天下的崩散所致，是一個那時尚在發展之中的問題。相關現象不少研究者也曾提及，竊以為還可以進一步提升到意識層面，以深化我們對五四的認識，也有助於理解那個時代（以及前後一二十年）的許多重要現象。本文側重於「國家」，惟因新名相的相互關聯，也要適當兼言「社會」，並及「文化」。

一、從名相模稜看國家概念的「早熟」

不少關鍵詞的涵義模稜，是五四時一個較普遍的現象。德里克(Arif Dirlik)早就注意到，對五四思想有決定性意義的「民主」概念，在（廣義的）五四運動進程中，以及對運動中不同的社會派別，具有不同的含義。在學生運動前的《新青年》雜誌中，民主更多意味着「思想民主」，有着疏離於政治的明顯傾向。到1919年5月，學生運動帶來的「政治化」使民主轉而成為強調人民參與權的「政治民主」。而同年6月工人階級加入後，民主的含義又出現向「經濟民主」傾斜的新轉化，推動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澎湃。而學生、工人和婦女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則分別從民主概念中找到了罷課、罷工和離開家庭的正當性。⁹

換言之，民主概念不僅是抽象的，它更是可轉化的，且在實際運動中已轉化為多種社會概念，成為思想鬥爭的目標。民主也不僅是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由於各種時空因素的作用，它在社會實踐中被「在地

8 羅志田：〈士變：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讀書人的革命情懷〉，《新史學》，第18卷，第4期（2007年12月）。

9 本段與下段，Arif Dirlik,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Republican China*, vol.12, no.1 (Nov.1986), pp. 6-7. 此文有中譯本，德利克：〈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見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引文參閱52-54頁。

化」¹⁰為各種具體的內容。這些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引伸義，可能與它原本的涵義有所疏離。因此，除非從五四倡導者和追隨者的互動中挖掘出民主這一可轉化的概念「在運動的進程中所獲得的多層意義，我們對此民主思想在運動中所起作用的理解是毫無意義的」。也只有掌握了這一術語在社會層面的多重具體意義，才能真正認識五四時代的「德先生」。

「德先生」如此，「賽先生」亦然。對五四前後的中國讀書人以及後之研究者來說，科學同樣有着多重的「在地化」含義，有的人看到了科學的精神，有的人注重所謂的「科學主義」，¹¹更多人關注的是表現在技術層面的物質力量。¹²在陳獨秀等人眼裏，科學常常意味着更本質也更準確的社會理解；¹³而在學人中影響更大的，可能是胡適所說的清儒治學方法。¹⁴

10 德里克明言，他所說的local不僅是地理意義的，更近於語言中所謂「方言」，大概兼具陳寅恪所說的觀空與觀時兩面。參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見《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64頁。並參見William H. Sewell, Jr., “Geertz, Cultural Systems, and History: 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 in Sherry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7–38.

11 參見D.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此書有中譯本：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 從康有為到梁漱溟，大體都傾向於此，詳另文。

13 在陳獨秀心目中，科學的人生觀就是唯物的人生觀，而唯物史觀的力量就在於「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陳獨秀：〈答適之〉（1923年12月）、〈《科學與人生觀》序〉（1923年11月），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卷，166、146頁。

14 如劉咸炘便說他本「不信科學方法能包辦人生」，卻又「採用科學方法來教導學生」。這個「科學方法」，當然不是王星拱、任鴻雋等人心目中的科學方法，不過就是「考據辨證的高級而已」。參見劉咸炘：〈看雲〉（1925年），《推十書·增補全本》（庚辛合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240頁；王星拱：《什麼是科學方法？》，《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任鴻雋：〈科學方法講義（在北京大學論理科講演）〉（1919年），見樊洪業等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任鴻雋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143–153頁。

名相模稜的形成，有時可能是隨意的，有時卻可以有意的。如西文的 nationalism 或 nationalisme，國民黨人譯為民族主義，青年黨人譯為國家主義。對後者來說，這是鄭重其事的有意選擇。李璜明確指出，一般人把這個詞譯作「民族主義」是不妥當的，容易強化人和種族之意，而淡化「一定領土、相當主權的重要意義」，所以必須要譯作「國家主義」。¹⁵ 問題是兩種譯意的西文原詞是同一的，馬君武便從兩者「自相衝突」中看到「不通可笑」的一面。¹⁶ 然而事情沒有那麼輕鬆，在 20 世紀 20 年代，尊奉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與尊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已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彼此都想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¹⁷ 這個現象或許比較極端一些，但也充分揭示出社會實踐中的「在地化」可以發展到離題甚遠的程度。

又如五四後風行的「社會主義」，對一些清季民初的學人而言，大體就是「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同義詞。¹⁸ 據陳獨秀 1921 年的概括，「除了『廢止資本私有』為各派社會主義共通之點以外」，社會主義「從來學說不一」，當時有力量的就有五派，即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行會社會主義，而「最要注意的是前三

15 參見李璜：〈國民教育與國民道德〉，收入李璜、余家菊：《國家主義的教育》，台北：冬青出版社，1974 年再版，71 頁；李璜：〈國家主義正名〉（1924 年），收入《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集），台北：中國青年黨黨史會 1983 年影印，25–28 頁。按從清季開始出現的「國民」就常是 nation 的中譯，而國民黨的英文表述也是 the Nationalist Party，則國民黨人似乎對李璜所說也有所感知。不過張東蓀也曾提出，「National 譯為『國民的』頗易誤會，似應改譯為『民族國家』」。見張東蓀：〈中國政制問題〉，《東方雜誌》，第 21 卷，第 1 期（1924 年 1 月 10 日），13 頁。

16 馬君武：〈讀書與救國——在上海大夏大學師生懇親會演說〉，《晨報副刊》，1926 年 11 月 20 日，45 頁（合訂本頁）。

17 要到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國民黨才逐漸走向與青年黨的合作。

18 如鄧實 1903 年便明言社會主義「即世界主義」，而蔡元培後來又將「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並論。參見鄧實：〈論社會主義〉，《政藝通報癸卯全書·政學文編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 年，96–97 頁；蔡元培：〈在清華學校高等科演說詞〉（1917 年 3 月），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3 卷，27 頁。

派」。¹⁹那正是社會主義風行之時，多種大致同義的名相既有「共通之點」，卻又各說不一，最可揭示時人心目中這一主義的指謂其實相當模稜。

尤其要注意的是，名相在社會實踐中被「在地化」為各式各樣的具體「社會概念」之後，便不必等同於其抽象意義。張東蓀稍早對社會主義也有與陳獨秀略同的觀察，他更意識到應區分「抽象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在中國「講社會主義的人」。²⁰雖然張東蓀不否認有抽象「主義」的存在，但確實只有弄清那些在中國「講社會主義」不同的人，才能明白社會主義這一可轉化概念在社會實踐中的實際轉化。其實北伐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社會史的論戰，多少也是此前對社會主義認知不一的延續。而那次論戰與其說釐清了概念，不如說進一步體現出名相「在地化」之後的百家爭鳴。²¹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長期爭議，體現出背後一個更基本的名相尚待釐清，那就是「社會」。從清季開始，「社會」就是個讓人看不清楚的名相。傅斯年的同學田培林回憶說，他的小學老師（大致和陳獨秀是一代人）在清末時使用的新教科書裏有「社會」一詞，學生「知道有『人』有『家』有『國』，可是社會非國非家」，怎麼也不懂。而老師顯然也不知道「社會」那從外國引進的新意思，只能以過去演戲、救火一類的「會」和「社」來解釋，這樣反覆講了一禮拜，還是沒講通。²²可知在河南的新學堂裏，「社會」這一新詞給師生帶來很大的困擾。

19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1921年1月），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344-345頁。

20 張東蓀先已指出，那時的社會主義至少有「工行的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多數的社會主義」（Bolshevism）、「無治的社會主義」（Anarchism）和「國家的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四種。東蓀：〈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7號（1919年12月），11、3頁。

21 關於那次論戰，參見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 郭廷以等：〈從高小到北大的求學生涯：田培林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2期（1991年2月），30頁。

《新民叢報》當時就意識到此種困擾的存在，特為讀者解惑說：「社會者，日人翻譯英文 society 之語，中國或譯之為群」，即「人群之義」，並非「立會之意」。此字「近日譯日本書者多用之，已幾數見不鮮矣。本報或用群字，或用社會字，隨筆所之，不能劃一，致淆耳目，記者當任其咎」。但該報相信「社會二字，他日亦必通行於中國無疑」。²³這一預測後來證明是正確的，然「他日亦必通行」，正說明當時仍未通行。

在前述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歧異的背後，有一個尚待釐清的基本名相，那就是「國家」。僅從漢字言，「國家」（以及「社會」）是很早就出現過的組合。但在近代，卻又是名副其實的新名詞。²⁴陳獨秀就曾說，八國聯軍進來時他已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以前就不知道「國家」是什麼。²⁵陳獨秀大概還是敏於新事物的少數，別人到那時也未必有和他一樣的認知。庚子後不久，我們就看到梁啟超指責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²⁶從這些先知先覺者的特別強調反觀，那時很多國人確實沒有國家觀念或國家思想。

其實梁啟超是舉人，陳獨秀是秀才，他們當然熟讀科舉考試最看重的「四書」。孟子已說「天下之本在國」（《孟子·離婁上》），《大學》中也有治國和平天下的區別與聯繫，²⁷故中國傳統中本有關於國家的論述。他們對這些經典中的言說棄而不顧，而徑取西方關於國家的定

23 〈問答〉，《新民叢報》，第11號（1902年7月5日），2頁（問答欄頁）。

24 關於近代西方「國家」概念的引入，參見張佛泉：〈梁啟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台北），第1卷，第1期（1971年9月）；Yu Ying-Shih,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p. 155–174；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5 陳獨秀：〈說國家〉（1904年），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44頁。

26 梁啟超：〈新民說〉（1902年），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21頁。

27 按梁啟超受歐戰影響，在自己歐遊時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反以治國平天下的層次來強調天下重於國家，詳後。

義，其取捨本身就揭示出「國家」名相的斷裂，²⁸特別能展現思想領域的權勢轉移。下面所說的國家，也循「名從主人」之意，基本不出新定義的範圍。

據此新的國家意旨，梁、陳兩位都側重「知」。這既是一種認識上的要求，也是一種認知上的需要。國家這個外來詞，有多個層面的意思。若用英文說，至少有 country、nation 和 state，其中 country 和 state 兩個層面又都有超出於群體人的含義，特別需要有所分疏：當我們說世界與中國時，這個「國」可能近於 country 多一點，而不是 state；然而與「社會」相對的「國家」，卻正是 state。五四常被稱為「愛國運動」，一般所謂愛國主義裏的「國」，又介於兩者之間。如果從所謂普遍抽象的意義言，這個「國」應是 country，但時人卻常常是從 state 的角度來討論「愛國」。

從清季開始，「愛國」就成為一個廣泛討論甚至引起爭辯的議題。²⁹這些討論其實也是怎樣認識這新興的「國家」（或反省國家概念）的進程。當張之洞說「保教必先保國」³⁰以及康有為、梁啟超師弟在清季就此進行辯論時，他們說的國基本是 country。³¹但陳獨秀到 1914 年則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故「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³²這裏的國，顯然已改為 state 了。幾年後他更明言：「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原

28 此承清華大學歷史系李欣然博士提示，謹致謝忱！關於「國家」名相的斷裂與傳承，當另文探討。

29 梁啟超在 1915 年說，「愛國二字，十年以來，朝野上下，共相習以為口頭禪」。梁啟超：〈痛定罪言〉（1915 年），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3 頁。

30 張之洞：《勸學篇·同心》，見《張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 年影印，第 4 冊，546-547 頁。

31 僅黃遵憲感覺到其間的問題，故特地把多數人所說的教與國的關係落實到「政與教」之上。參見黃遵憲：〈致梁啟超〉（1902 年），見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486-488 頁。

32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1914 年），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1 卷，150 頁。

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³³ 這個國仍是 state。這些「先知先覺」者不能代表所有人，仍大致可以看出一個從 country 向 state 轉移的進程。

現在我們已經充分接受外來的國家概念，並習慣了以國家作為觀察和思考歷史事件的單位，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問題。但在國家觀念剛剛起來的時代，國家是不是有那麼重要？或者說，我們是否可以假設五四時代的當事人都會從國家視角看問題，或在國家立場上想問題？他們在有意無意間是否會從更習慣的天下視角看問題，甚至在意識層面從非國家的視角看問題呢？如果昔人確實這樣看了，我們是否因為自身眼光的慣性而忽視了他們的思考呢？

畢竟五四前後的當事人本身面臨着一個對國家的熟悉化進程，處在一個類似於英語語法中「現在進行時態」的過渡時段，在由生疏到熟悉的進程中要用尚未定型的名相來思考和詮釋其所見所聞，必然不像後人那麼駕輕就熟。他們在意識層面或許會努力趨向於產生中的名相，但在下意識層面，無意中恐怕仍延續着新名相產生前的意態。³⁴

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曾有「駕駛汽車的人仍使用騎馬者的詞彙」的比喻，³⁵ 五四或許就是一個從騎馬向駕駛汽車轉移的時段。時人尚未完全脫離「騎馬」的時代，卻已提前使用「汽車」時代的詞彙；而他們在

33 陳獨秀：〈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1919年），見《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114-115頁。

34 據周月峰老師對《新青年》詞彙的統計，「國家」一詞出現了三千多次，「社會」達一萬多次，而「天下」僅四百多次，很能看出名相的進退趨勢。惟時人雖未必經常使用「天下」一詞，在他們關於「國家」和「社會」的表述中，仍隱約透出「天下」的意態。與此相對，在可計算的梁啟超文字中，「國家」一詞出現了六千多次，「社會」四千多次，而「天下」則有五千多次，很能體現梁啟超與《新青年》作者的代際差異。我要特別感謝周老師提供他的統計！

35 勒戈夫 (勒高夫)：〈心態：一種模糊史學〉，見勒戈夫和諾拉 (Pierre Nora) 編、郝名瑋譯：《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法國新史學發展趨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272頁。